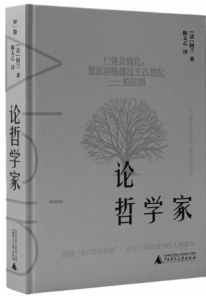




杨义堂

荐书堂

主办单位：济宁晚报 济宁亚龙书城



《论哲学家》

这是一本探讨哲学家和他们思想的论著。阿兰以媲美《蒙田随笔》的优美书写召唤一众哲学巨匠的灵魂,与他们形成“社群”。在这个“社群”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等伟大的思想家汇聚一堂,与读者对话、交锋、争鸣。



《五秒钟是什么概念》

本书共收录作家锦璐近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十篇。以梅老板和阿茂分别代表城市的富裕者及小人物,构筑出双线交织的结构,揭示了无论何种人都有作为人而绕不开的困境及劣根性。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整理)

第六章 萧县杆子队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郭影秋从徐州城里逃出来,来到徐州西南的萧县,他在徐州总动委会和苏鲁豫皖特委工作期间认识了萧县的党组织联络人李砥平,就准备去找李砥平。恰好在路上遇到几位装扮成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竟然是徐州总动委会的,郭影秋不认识他们,但他们都认识郭影秋,其中有一个萧县的青年,听说了郭影秋的想法,说自己家离李砥平所在的李酒店村不远,就领着郭影秋去找李砥平。

李酒店村位于萧县西北部,北边是皖北重镇黄口镇,西边是砀山县程庄乡,西南接河南省永城县的条河乡,村里的道路四通八达,是附近几个县交会处的大集市,街上有好几家酒店,这也是李酒店村村名来源。他们在一家开酒店的人家里果然找到了李砥平,李砥平今年二十八九岁,个子又瘦又高、大眼睛、厚嘴唇,一看就是一位诚实又刚毅的青年,他正在家里为与上级党组织断了联系而发愁呢,突然见到了郭影秋,真是喜从天降!

李砥平向郭影秋介绍萧县党组织的现状:中共苏鲁豫皖特委黄口会议后,计划在这里建立中共徐西南区委,还没等组织起来呢,敌人就打来了,萧县没有共产党的县委,只有一些零散的党员。目前,萧县还有20多个党员和13条步枪。

郭影秋与李砥平商量,决定组织起萧县陇海路南区委。同时利用现有的13条枪,拉起抗日队伍。因为这一带有个传统,只要高粱棵子一起来,就有人拉杆子当土匪。现在,正逢国民党军队战败、兵荒马乱之际,到处扔的都是枪支弹药,更为拉杆子创造了极好条件。萧县目前共有18支大杆子,也就是18股土匪武装,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人。经过一番酝酿,他们也组织起来,推举了一位叫何光友的党员做队长,因为他曾经干过土匪,与附近的一些大杆子都有联系,让他担任队长,便于与其他杆子周旋。杆子拉起

来后,人和枪陆续增多,一直到拥有七八十人、五六十条枪。

郭影秋和李砥平对战士进行了爱国抗日教育、纪律教育,战士们的表现很好,和别的土匪组织明显不一样。但是,队伍活动起来困难很多,吃饭就成了大问题。端午节前后,战士们去一个村上借粮,到了几个富户人家,都遭到了拒绝。队伍中有几个土匪出身的人就非常生气,骂骂咧咧,决定实施绑架。郭影秋知道了,出面劝阻,好说歹说总算是制止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郭影秋就听到了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声。“有情况!”郭影秋心里一紧,赶紧起床,就看见附近的村寨一片火光,不一会儿,又看见成群的战士挑着面、提着鸡、赶着猪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原来,趁着郭影秋睡觉的时候,这些人去打家劫舍了!郭影秋不好上前硬性阻拦,但是他非常难过,怎么样才能改造这土匪出身的游击队呢?这样发展下去,这支队伍可能真的变成土匪了!

一天傍晚,他们刚刚在一个村子驻扎,正准备生火做饭,在村外警卫的战士推推搡搡地带进来一名男子,他用草绳子扎腰,绳子上别着一个货郎鼓。战士们说这个人一直跟在队伍后面打探情况,肯定是一个奸细。郭影秋一看这个人的豁嘴,立刻乐了,这个被抓的货郎竟然是外号“豁嘴李”的李公俭同志!郭影秋曾经和李公俭在徐州监狱一起坐过牢,在特委的时候也一起工作过,彼此很熟悉。

革命同志意外相逢,又是在这个时候,更显得格外亲切。李公俭告诉郭影秋,他现在当了徐西北区委的交通员,他是专门奉徐西北区委的命令,来淮海铁路南联系党组织和游击队的。

郭影秋问:“我记得你是沛县县委书记,我兼任铜北县县委书记,你们沛县的情况怎么样?”

(未完待续)



曲阜碑刻(四十八)

阙里宅庙落成碑

李东润

阙里宅庙落成碑,立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十月,现位于孔庙十三碑亭。碑高2.6米、宽1.16米、厚0.34米。碑文共20行,每行24字。阙里宅庙,即孔庙。此碑刻记录了元代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自费重修孔庙的事迹,反映了元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政策的相关信息。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国君都采取了尊崇儒家的举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也是如此。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金廷拨巨资大修孔庙,不仅将孔庙修葺一新,还进一步扩大了其规模。但好景不长,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蒙古兵南下中原至曲阜,孔庙遭到严重破坏,据此碑刻记载,“贞祐一燬,久而未复”。

蒙古人人主中原建立元朝后,为巩固政权,延续前朝“尊孔崇儒”的政策,据此碑刻记载:“历代有国之君,崇尚其教,庙而祀之,几遍天下……我元列圣,尊道劝学之心,未尝不切。”蒙古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朝廷下诏令衍圣公孔元措修阙里孔庙,因所拨经费不足,仅复建寝殿,暂寓先圣及十哲像。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曲阜县尹兼主祀事孔治拨县银修复了孔庙的部分建筑,但同样因经费不足导致孔庙核心建筑大成殿没有得到修复。直至元大德元年(1297年)十一月,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奏请朝廷,“自输钱币”维修孔子庙。按檀

不花领导的孔庙修复工程于大德四年秋八月动工,于大德六年九月完工。这是元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孔庙维修工程,花费巨大,终于将孔庙建筑修复一新。竣工后当地立碑建亭,以纪其事。

元廷多次将修缮孔庙的任务交给孔氏子孙执行,背后有深层的政治考量:以孔治为代表的孔氏子孙参与修缮孔庙不仅体现了孔氏家族对祖庙的维护责任,更反映了元廷意图利用孔氏家族的影响力来加强儒学在社会上的传播和影响,以此来表明元廷对儒学的尊重,提升汉人对元朝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增强元朝的政权合法性。但在按檀不花大修孔庙之前,历次孔庙修复工程的效果均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元王朝建立之初,面临恢复和稳定

新征服地区经济的巨大压力,据元初的户部员外郎胡祇通给元廷所上奏疏记载:“民以饥馑奔窜,地著务农,日减月削……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四。”(《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这反映了元朝初年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抛荒问题,农业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尚且如此,元代初期朝廷的经济压力之大可见一斑,这无疑限制了元廷对孔庙等文化设施的经济投入。

于是,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祇承朝廷德意”,自费重修孔庙。“达鲁花赤”一词由蒙古语音译而来,指“地方长官”。元代在全国各地设立行省,在行省之下设立路、府、州、县四级行政单位,这四级地方行政机构中都设置有达鲁花赤一职,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审理案件、征收赋税、管理地方官员等。据《巨野县志》等史料记载,按檀不花任济宁路达鲁花赤期间,兴修景教寺宇,重修阙里孔庙,参与道教庙宇的建设,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总的来说,碑刻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能有效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阙里宅庙落成碑的碑文涉及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儒家文化等诸多内容,从多个维度展现了元初的政府行政情况、文化政策、社会面貌,是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学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